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唐〕李德裕 撰
傅璇琮
周建國 校箋

李德裕文集校箋

上

中華書局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李德裕文集校箋

上

〔唐〕李德裕撰
傅璇琮校箋
周建國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德裕文集校箋/(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國校箋.
—北京:中華書局,2018.3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ISBN 978-7-101-13001-0

I.李… II.①李…②傅…③周… III.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唐代 IV.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317998 號

責任編輯:魯明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李德裕文集校箋
(全三冊)

[唐]李德裕撰
傅璇琮 周建國校箋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35%印張·6 插頁·690 千字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108.00 元

ISBN 978-7-101-13001-0

新版序

傅璇琮 周建國

一

本世紀初，《李德裕文集校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一十二年了。十餘年來，學界反應熱烈，使我們得以聽取學界同行的意見，認真反思我們的工作，並在讀書學習中注意相關的問題，續有所得，即隨時補錄相關資料。這次增補修訂新版的出版，既是這一課題的現階段小結，也可說是向學界同仁嚶鳴求友的匯報。

回顧學界對本書的衆多肯定贊揚，我們惟有把着實事求是之心，力求學業之精進。專精唐代文獻的陶敏教授率先對本書徵引文獻豐富及編撰時間久長作了肯定。專家的意見既使我們受到鼓舞，更使我們惕厲。這是因為本書詩歌部分的人名考證，曾由陶敏教授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而他的名著《全唐詩人名考證》亦給予筆者不少啓益，這些都是需要特別指出的。在相關的評論中，一些中青年學者的評論尤爲我們關注。他們不少

已是當今學界卓有成績的學者，限於篇幅，今舉其要：如浙江大學胡可先先生撰有《古籍整理的途徑、規範與方法——從〈李德裕文集校箋〉說開去》（《中國文化研究》二〇〇一年夏之卷），復旦大學查屏球先生撰有《鏗而不舍，予人以善——評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中華讀書報》二〇〇〇年八月十六日），安慶師範學院汪長林先生撰有《天緣助良知，精品示軌轍——讀〈李德裕文集校箋〉》（《安慶師範學院學報》二〇〇〇年第六期），北京語言大學曾廣開先生撰有《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傅璇琮先生訪談錄》（《中國文化研究》二〇〇八年冬之卷）。諸位先生對本書作了高度評價，或謂此「是近年來古籍整理中一部典範之作」，或謂「令人歎為觀止」，或謂「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這些我們愧不敢當，但諸君對於我們的高度期許，應是筆者努力的方向，我們高興地看到諸君對本書的評論能夠緊緊結合筆者相關的論著而進行，具體而切實。這正顯示李德裕與中晚唐文學及黨爭問題是當今學界共同關注的課題。人們就相同或近似的課題展開嚴肅而友善的探討，必多知者之言，必能相互啓益，求同存疑，有助於學術進步。諸君不約而同提及傅璇琮作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一九八四年）、《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文學評論》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牛李黨爭與唐代文學研究》（《文史知識》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以及《關於〈李德裕集〉的一封信》（《古籍研究》一九

九六年第三期）；並提及周建國的《關於唐代牛李黨爭的幾個問題》（《復旦學報》一九八三年第六期）、《試論李商隱與牛李黨爭》（《文學評論叢刊》第二十二期，一九八四年）、《鄭亞事蹟考述》（《文史》第三十一輯，一九八八年）、《煌煌唐韻》（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由此可見，本書校箋雖然多涉及考證，其蘊含的歷史是非的原則與文化探究的意向，是為評論者所理解的。這樣，諸君的評論就展示了中晚唐文學與歷史之較為寬廣的背景，觸及到中晚唐文史研究的若干關鍵問題。

傅璇琮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前言中曾指出：「中晚唐的文學，是在較前期更為複雜的社會鬥爭中發展的，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學，或許會比研究初唐和盛唐更能引人入勝。但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有更為廣博的歷史知識，更為充實的資料基礎。」我們高興地看到當今對本書進行講述的讀者諸君，大率表現出較深的文史知識，有着良好的專業素養。如今有志於中晚唐文史研究的學人漸漸有了這樣一種認識：這一研究不能避開牛李黨爭，而牛李黨爭的核心人物是李德裕。中晚唐文學的複雜情況，需要從牛李黨爭的角度加以考索；而要研究牛李黨爭，最直接的辦法則是研究李德裕。這些觀點在眾多的評論中基本得到認同。而我們合作編撰《李德裕文集校箋》更清晰地認識到：對李德裕研究，一方面當然要論析其政治主張與實踐，考證有關史料記載的真偽；另一方

面，也就是基本的一點，則應認真整理、校訂其文集，使作品儘可能詳實、完整地提供給當世，讓我們現代人能從其作品中更確切地瞭解這一歷史人物的全貌。一九八七年，周建國在對《李德裕年譜》作了研究後（一），向傅璇琮建議合作整理《李德裕文集》。經過長期的資料收集、鑑別，往復研討將近十年，我們終於編撰成《李德裕文集校箋》。胡可先先生評論說：「傅璇琮與周建國先生研究李德裕以及牛李黨爭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們就有重要的論著問世。」汪長林先生則把我們的合作歸結為「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著力追求『文化學的批評』方法」（二）。評論者對我們的鼓勵時時促使我們反省，如今回顧來路已走過三十年矣。學無止境，自忖惟有鍥而不舍，努力前進，方能不辜負讀者「予人以善」的期望吧！

二

本書既蒙學界同仁推許，那麼，我們編撰的特點及其用意何在？這次修訂增補新版的依據及其用意又何在？聯想起曾廣開先生在《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傅璇琮先生訪談錄》一文中問及《李德裕文集校箋》的校勘原則問題，其實是從不同角度提出的互有關聯的問題。

李德裕之文學在當時有「大手筆」之稱，不僅杜棕對牛黨當首李宗閔稱「德裕有文學」，而且歷代論者對此都不乏好評。但他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歷代究心於治亂興亡的學人更多地是從作者的政治主張及其實踐去評述其文集的。明末民族英雄陳子龍在其自撰年譜崇禎十二年己卯中說：「予又以唐興元之有陸敬輿，會昌之有李文饒，皆中興之相也。思如二公之人而不可得，因評論其集合梓之，頗行於世。」^{〔三〕}宋代以來，李德裕文集雖然代有整理刊刻，但像陳子龍那樣作過評論而頗行於世的刊本就沒有流傳下來。《李德裕文集校箋》是文獻整理方面的著作，但仍會遵照先賢突出作者政績事功及其歷史地位的用意，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我們力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統攝本書所涉及的諸項考據，把校箋的重點放在每篇作品的繫年，並徵引史實確定其歷史背景，闡述其文化氛圍。這些大致涉及相關人物的交遊出處，人事關係、歷史事件、交通地理等方面的考證，綜合起來，便讓讀者有信實之感。我們一般不採用傳統的文學類著作的整理模式，去花費大量精力考釋典故、詞語的出處，探研藝術意蘊。當然，考慮到作者精通《漢書》的特點，其父李吉甫撰有《元和郡縣圖志》以及李氏父子均精於輿圖地理的事實，還有其父子都喜好書畫且富有收藏等情況，我們在校箋中對其文化傳承及家學淵源仍有所關注。這樣既可明其作品語意所

自，對於一些處於疑似之間的作品則增益了可信度。

本書打破文集編次，另外按年代先後編有《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四百餘題，俾得研讀此書能按年查閱作者詩文，尋繹其思想人生之歷程。與此相配合又編附錄三部分：

其一，《李德裕年表》。其二，《有關本書的李德裕集題跋》。其三，《史書所載李德裕奏對及紀事》。這次新版增補了唐五代及宋人筆記中的資料數則，改稱《文史典籍所載李德裕奏對諸語及紀事》，以便更符合實際。所有這些材料既是對李氏文集的補充，也是對其思想生平各有側重的凸顯。

第二，本書充分利用和借鑑相關的學術成果，尤其是現代兩位唐代史大師陳寅恪、岑仲勉的論著，是者是之，疑者辨之，這些在書中都一一注明了，不敢掠美，亦不敢盲從。陳、岑二位對李德裕有很高評價，如本書引錄的《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會昌伐叛集編證》等論著，在作者嚴謹的敘述中，我們便能感受到他們對歷史人物的崇敬之情。這也就提醒我們不能為考證而考證。在衆多的史料中提煉史識，正是讀史者必須關注的一個問題。

此外，從唐代文史典籍整理的角度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出現了許多高水平的論述考證之作，如果不注意吸收這些研究成果，《李德裕文集校箋》就很難與同時代的

佳作壘篋相應。我們認真分析鑑別當今同道的優秀成果，不論其年輩資望，擇善而從。胡可先先生在評論中特別指出：「從這裡看出，傅先生與周先生，無論對於前輩還是後輩，都一視同仁地對待。」推獎同道之成果，表而出之，亦吾輩之樂事也。

第三，精心選擇底本和校本，自從萬曼先生的《唐集敘錄》問世後，唐人別集版本源流的研究也取得較大的成果，足資參考。但就我們這一課題論，如何選取工作底本仍需要具備一定的眼光，並為之付出艱苦的辛勞。一般來說，要選擇善本做底本和校本。何謂善本？就是足本、精注精校本和宋元舊本。通過對現存的李德裕文集的版本進行系統的梳理，我們最終選定現收藏於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的原韶宋樓本《李文饒文集》作底本。此本是陸心源用月湖丁氏影宋鈔本所補校過的，不僅保存了宋本舊貌，而且補苴闕漏，使之完備。根據李德裕文集的流傳情況，選定十五種刊本做參校本。其中最有價值的是黃丕烈、翁同龢先後收藏過的宋殘本《會昌一品制集》與北京圖書館的傅增湘校本《李文饒文集》。我們得以利用黃丕烈、陸心源、傅增湘諸先賢的校勘成果，使得這部書有了一個高的起點。

第四，遍校群書。為了畢其功於一役，我們除了運用校本、校記來校勘外，還儘可能地收羅文獻資料。採用新舊《唐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唐會要》《資治通鑑》《唐大

詔令集》等相關文獻典籍，以及唐宋類書、筆記、近數十年出土的碑誌來參校、輯佚，發現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問題。其中尤以《資治通鑑》及司馬光之《考異》對我們幫助最大，蓋司馬光編《通鑑》時不僅掌握的材料極其豐富，而且修史時間充裕，恰如陳寅恪在講授唐史時強調：「讀正史後方知《通鑑》之勝」〔四〕。讀者細讀本書，當與編撰者有同感也。

第五，本書力求對李德裕所有作品作全面編年。全書以作者會昌時期任相時的作品為主，這是當年編纂時李德裕、鄭亞的共識，目的是突出會昌之政的歷史功績，故命之為《會昌一品集》。但會昌前後，早在元和、長慶，晚在大中的作品仍不少，這些作品與會昌之作仍貫穿着一種建功立業的精神。當作者在遭受嚴重政治打擊時亦曾萌生歸隱全身、避禍自保的想法。這少數詩文正好與全書主調形成相輔相成的整體。本書末後所編《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四百餘題，僅有個別作品未能確定，疑則存疑。這樣一份確實的編年目錄對於讀者瞭解作者作品之全人全貌應是有所裨益的。

與李德裕、鄭亞突出會昌政績的編纂目的相適應，我們在編撰附錄一《李德裕年表》中特地於會昌時期展開了三個敘事空間：《會昌之政一：關於朝政、科舉與宗教》，《會昌之政二：關於摧抑藩鎮》，《會昌之政三：對回鶻吐蕃等擾邊之對策》。這些都是李德裕

秉政時關注並大力推行的政策，李氏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思想意願，也可說是關涉牛李黨爭的重大政爭。我們很欣慰地看到讀者對此是有所體察的。汪長林先生評論說：「這份《年表》在編撰體例上可說是不落常規，別有創意：其一，它並不是按時間順序逐年編述，而是擇要編述；其二，突出了會昌之政；其三，將史家紀事本末體方式運用於年表的撰述中來……就其分標題以著意『突出德裕會昌秉政之功績』而言，亦不啻於鄭亞作序『深得德裕來書中「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的弦外之音』一樣直撦德裕心神了。」如此評價過獎了，但作者、編者、讀者歷千百年而能對其中一些重大理念產生共鳴，誠鄭亞序所謂「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也。

三

我們之所以一再重申這些編撰校箋原則是因為其正是編撰者十二年來不時增補修訂所遵行的準則。這次新版增補修訂主要如下：

其一，增補佚文一篇。從文化傳承的角度分析考量，我們確定故宮博物院所藏歷史名畫《步輦圖》題跋為李德裕所作。題跋中精確的年月日「大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與李德裕仕履合樺的官職「中書侍郎平章事」，和準確追述歷史事件年月的「貞觀十五年春正

月甲戌」，說明題跋必定出自親身經歷而又精通本朝歷史的李德裕。具體考證可參見傅璇琮、周建國撰《〈步輦圖〉題跋爲李德裕作考述》（《文獻》二〇〇四年第二期）。

然而，此畫已非閭立本原作，而是北宋初期的臨摹本。畫後部有宋初書法家章伯益過錄李德裕題跋的篆書十四行。跋文顯示對於外族入侵堅決抵抗的宰相李德裕，對待友好的來朝使者則堅持漢胡和睦的政策，這又正是當年唐太宗所實際推行的民族政策，並在李氏文集得到反映的。此外，李氏題畫之作往往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如本書所收錄的《進真容讚狀》《進黠戛斯朝貢圖傳狀》《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圯上圖贊》等，都是與繪畫有關、歷史政治色彩濃厚的文章。會昌時期，他所撰《進黠戛斯朝貢圖傳狀》即反映了其堅持唐太宗天下一家、漢胡和睦的民族政策，與《步輦圖》題跋所說是前後一致的。兩相參稽，讀者自可增加其可信度。

歷史事實在矛盾的陳述中被清理出來。檢驗相關題畫之作，我們最初對《新補李德裕佚文佚詩》中《輞川圖跋》尚小心存疑，如今則增益了信心。洪邁《容齋三筆》錄李德裕題跋兩則：一則題於「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另一則題於「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時間正好是《步輦圖》大和七年題跋的前後。年月日分明，下署官職或鈐官印，其格式正如與之前後相應的《步輦圖》題跋。《輞川圖跋》說到其父李吉甫的書畫收藏之豐富曰：「乘

閑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由此可見，他所經目的歷代書畫名迹之多。作爲一代名臣，李德裕題寫的手迹，還被歐陽脩《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等著錄，可見流傳之廣。上引洪邁文的結處云：「雖今所傳爲臨本，然正自超妙。」說明洪氏所見李德裕父子題跋同樣是由臨摹者過錄的，這與宋初摹本《步輦圖》的題跋情況相似。原來唐五代至宋，宮廷流行書畫臨摹，宮廷高手對前賢書畫名作的臨摹本被稱爲「下真迹一等」之副本，歷來被珍視。北宋黃伯思在《又跋輞川圖後》說：「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蹟之不失其真者，當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黃氏推斷其所見出自李德裕家的定本，可見這臨摹本流傳有序。我們將此類書畫題跋置之彼時之歷史文化背景來考察，參證相關學者文人的記載，曾被人們懷疑的理由終於漸次得以祛除，遂大大增益了其可信度。

其二，本書附錄一《李德裕年表》原來十三節，起自李氏出生，止於李氏病逝，擇要譜述。這次新版增補第十四節《李德裕卒後其子孫親屬之狀況》。此類情況曾爲史家所重，而《李德裕年譜》大中九年乙亥（八五五）、大中十四年咸通元年庚辰（八六〇）、咸通九年戊子（八六八）、昭宣帝天祐二年乙丑（九〇五）、五代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戊辰（九〇八）已

有簡略譜述。陳寅恪《金明館叢稿·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辨證》於李氏子孫及其政事文學有較爲精詳的考述。此文除引述常見之史籍外，又引薛居正《五代史》、吳任臣《十國春秋》、韓偓《玉山樵人集》、錢易《南部新書》等文史典籍，贊歎贊皇後人當時世遽變、天下大亂之際，不管其北守家園，抑或南下避亂，皆能以忠義自守，或避亂自存，其司空圖、韓偓之流亞歟？陳氏有言：「他時若有補作年譜者，願以茲篇獻之，儻亦有所取材歟？」謹采錄陳文精擇之相關文史典籍材料，以證贊皇後人能自樹立，且風雅自存，不替家聲。此或勉副前賢之遺願乎？敬請讀者正之。

其三，本書附錄三《史料所載李德裕奏對及紀事》，原先主要從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史書中輯錄。這次新版增補又從唐五代及宋人筆記《戎幕閑談》《北夢瑣言》《南部新書》《類說》等各輯錄一則，從《通鑑》及《考異》《胡注》輯錄十二則，總計新補十六則。爲更符合實際情況，改稱《文史典籍所載李德裕奏對諸語及紀事》。這些材料有不少出自當時尚存的李德裕《西南備邊錄》《文武兩朝獻替記》殘文。箋校時或參證新舊《唐書》《唐會要》等史料，遺則補之，誤則正之，這對於李德裕政事及相關言行的補充完善頗有裨益。

《戎幕閑談》係大和五年李德裕任西川節度使時囑其幕府巡官韋絢所作。其序云：

「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語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賓佐宣吐，亶亶不知倦焉。乃謂絢曰：『能題而記之，亦足以資於聞見。』絢遂操觚錄之，號爲《戎幕閑談》。」韋絢序文說明此書所錄多爲李德裕語，從歷史文化角度看，李德裕本人撰有《明皇十七事》（亦作《次柳氏舊聞》），此書同樣採用筆記小說形式，間或雜以怪異之說。另有一位做過李德裕幕府從事的段成式寫過著名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乃至牛僧孺著有《玄怪錄》等，錄此一則，亦可見彼時文人學者之風習。

《類說》引《獻替記》中《停罷給食利文牒判》一則尤可注意。今《獻替記》殘文大多見於司馬光《通鑑考異》，而見於筆記者較少。本附錄得諸《續談助》者三則，得諸《類說》者一則。宋人筆記中存有唐賢之寶貴史料，正在於讀史者披沙揀金耳。《停罷給食利文牒判》批判的是當時官商勾結、貪污腐敗的惡政。《新唐書·李德裕傳》曰：「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李德裕於大和七年二月任相，六月李宗閔罷相，此文即作於其時，表現了他銳意進取，興利除弊的決心。

其四，這次新版對全書進行審核，糾正了原版中的一些錯訛。《李德裕詩文編年目錄》中《存目詩文》刪去了據《寶刻叢編》卷八所錄《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弘規碑》一題。按

編年目錄大和元年，即可查到別集卷六有《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一篇，碑爲劉弘規而作。《寶刻叢編》誤作「王弘規」，乃重出誤收。本書出版後，承學界美意，多有褒獎，但復旦大學楊明教授指出其中《外集》卷三《文章論》里作者自注：「猗於元勳，包田舉信」語出《漢書·敘傳下》，乃頌贊蕭何之意。此誠空谷足音，使我們得以改正標點錯誤。是所有望於讀者之指正，俾得日進日新，不斷改進。

四

歷史文本在不同時代的意義是在與歷代讀者的對話中實現的，惟有優秀的文本才會歷千百年而令歷代學者誦其詩文，若日月常見，光景常新。《李德裕年譜》大中三年輯錄有關李德裕政治、文學、著作、生活等的評論，從晚唐到近現代，如李商隱、裴廷裕、李之儀、葉夢得、王世貞、王士禎、羅振玉，不乏「萬古之良相」、「第一等人物」、「相業彪炳，而文采亦冠於當世」等極高評價。論者皆飽學之士，豈虛語哉。

李德裕生當晚唐亂世。其時藩鎮割據、朋黨林立、科舉舞弊、吏治敗壞，朝廷內宦官專權，兼之邊境時有外族侵陵，可謂矛盾重重。他敢於在此時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尤其在大和、會昌時期兩度秉政，推行改革，內定叛鎮，抑制權閥，整肅吏治和科舉，外禦回鶻等